

資產階級社会学、哲学資料汇编

第一輯

• 内部資料 •

科学出版社

資產階級社会学、哲学資料汇编

(第一輯)

· 內部資料 ·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譯
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8

內 容 提 要

这里搜集的資料包括近年來國外資產階級社会学和哲学兩部分的資料：在 sociology 部分有第一、二、三屆國際社会学大会的發言摘要和國際社会学协会的領導成員的資料，該协会的章程以及資本主义國家社会学家的著作摘要；哲学部分有印度哲学、巴基斯坦哲学、西德哲学和新托馬斯主义哲学的資料。

2672/23

資產階級社会学、哲学資料汇编

第 一 輯

• 內部資料 •

編譯者 “哲学研究”編輯部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 京 文 新 印 刷 厂

發行者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京) 9001-1 300

書号：1357 字數：440,000

开本：550×1168 1/32

印張：15 3/4

定价：2.20元

目 錄

第一部分：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

(一) 第一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1950年于蘇黎世舉行) 的資料	(1)
一、第一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1)
1) 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總干事鮑戴的來信;	
2) 維爾特在開幕式上的致詞; 3) 喬治·大衛在開幕式上的致詞; 4) 柯文西·賴特在開幕式上的致詞。	
二、大會的主題	(11)
1) 社會學的一般問題和方法問題; 2) 民族關係和民族性格; 3) 社會學的民族關係方面; 4) 聯繫的選擇。	
(二) 第二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1953年于列日舉行) 的資料	(40)
一、第二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40)
二、國際社會學協會的章程	(40)
三、羅伯特·安杰爾的緒論性發言	(42)
四、大會的主題	(43)
1) 社會成層和社會流動; 2) 集團之間的衝突和調解; 3) 社會學研究工作的發展; 4) 社會學家的教學、業務活動和責任。	
(三) 第三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1956年8月于阿姆斯特丹舉行) 的資料	(88)
一、緒論性報告	(88)
二、經濟結構的變遷	(101)
三、階級結構的變遷	(116)
四、家庭變遷	(146)
五、教育變遷	(156)
六、對社會變遷問題的總的評述	(161)
七、社會學教學和社會學家的業務活動, 現代社會學	

的研究工作方向	(165)
(四) 國際社會學家協會領導人員的資料	(185)
一、羅伯特·斯·安杰爾，協會主席及該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185)
二、莫里斯·金斯堡，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88)
三、喬治·大衛，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90)
四、廖波德·芳·維茨，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91)
五、皮埃爾·德·比，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
六、特·特·謝格斯梯德，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5)
七、赫·茲·烏爾肯，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7)
八、格·斯·古里耶，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7)
九、克·阿·布西亞，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9)
十、大衛·格拉斯，研究委員會主席	(201)
十一、喬治·弗利德曼，研究委員會委員	(202)
十二、萊涅·凱尼格，研究委員會委員	(206)
十三、卡布里爾·列·布拉，協會教育問題委員會領導人	(212)
十四、特·皮·鮑托摩爾，協會執行書記	(214)
十五、特·赫·馬歇爾，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	(220)
十六、喬治·顧爾維奇，社會學家	(221)
附錄(1) 關於廖波德·芳·維茨的參考資料	(245)
附錄(2) 烏爾肯：“伊斯蘭教思想”一書若干章節的摘要	(284)
(五) 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學著作的資料	(311)
一、社會進步和所謂“社會變遷”	(311)
1) 英國社會學家莫里斯·金斯堡的“進化思想”一書概要；	
2) 法國社會學家喬治·弗利德曼的“進化的窘境”一書的簡介；	
3) 印度社會學家格·斯·屈里的“社會過程”一書的簡介；	
4) 喬治·阿·魯登貝格、克拉倫斯·克·斯雷格和奧托·恩·納爾遜所著美國社會	

学教科書“社会学”第十八章“社会变迁”的序言和結論；
 5) 对貝尔所著“歷史綜合及其与普遍綜合的联系”一書的評論；6) 对“國際社会学公报”的“技術進化的社会影响”專号的評介；7) 国际社会学学会1956年4月11日至19日在薩格勒布圓桌會議上关于地中海区域國家的中產階級作用問題的決議的草案；8) 尔·曾布里斯所著从罕摩拉比到孔德的“社会思想”一書关于孔德的社会進化观点的摘要。

二、家庭 (354)

1) 关于阿尔娃·密尔达丽；2) “現代比較家庭社会学”一書的序和第十一章的節譯；3) “英國社会学杂志”刊載征·威朗赫比对罗伯特·布里然所著“家庭观念的复兴”一書的評論；4) “英國社会学杂志”刊載的兩位英國社会学家烏·貝尔达馬斯和賀尔·希姆斯的“費解的家庭”一篇論文的簡介。

三、第三屆國際社会学大会参加者的补充材料 (368)

1) 比格尔霍尔·埃尔涅斯特和皮尔所著“若干現代毛利人”一書的序和第九章的節譯；2) 比格尔霍尔·埃尔涅斯特的报告的序和結論的節譯；3) 关于巴西社会学家日尔貝托·弗雷里的若干材料；4) 关于墨西哥社会学家，國立墨西哥大学教授盧西奧·孟迪达-伊-倫溫斯的若干材料。

第二部分：資產階級哲学資料

(一) 关于印度哲学和社会学的資料 (381)

一、“希臘和印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一文摘要 (381)

二、第28屆印度哲学家代表大会与印度大学中的哲学教育 (394)

三、在印度、美國、法國报刊上关于印度哲学問題的文章 (398)

四、阿·瓦迪亞的“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能否綜合”一文 (404)

五、斯利尼瓦斯的“印度哲学和现代思想体系”一文…	(407)
六、关于印度哲学和社会学的书籍简介 ……………	(413)
(二) 关于新托馬斯主义哲学的资料 ……………	(419)
1955年下半年的三次新托馬斯主义者哲学会议 ……………	(419)
(三) 关于西德哲学的资料 ……………	(430)
1954年9月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德國哲学家第四次代表 大会 ……………	(430)
1) 会议简介; 2) 对鲍尔·齐里赫的“谢林和存在主义 反抗的开始”一文的評述; 3) 对耶柯比的“不依主观 为轉移的客觀性”一文的評述; 4) 对尔·馬尔庫茲、 尔·安惹罗斯的“美國和德國的实用主义”一文的評 述; 5) 对阿洛依茲·溫茨尔的“个别科学和形而上 学”一文的評述; 6) 对弗利茨·海涅曼的“哲学和精 神的領導”一文的評述; 7) 对庫尔特·溫申柯的“論 意識的性質和工作”一文的評述。	
(四) 关于巴基斯坦哲学的资料 ……………	(462)
一、巴基斯坦哲学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56年4月 10—12日, 佩沙沃市) ……………	(462)
1) 大会程序和組成; 2) 加齐·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的 “和平的基礎”演說的摘要; 3) 阿布杜尔·卡季尔的 “倫理学的知識”演說的摘要; 4) 高文达·罕德拉· 狄夫的“未來哲学的一綫光明”一文的摘要。	
二、巴基斯坦报界报导苏联哲学家参加巴基斯坦哲学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情况 ……………	(479)
1) “巴基斯坦泰晤士”报所刊载的苏联教授在拉合尔 講演“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摘要; 2) “巴基斯坦泰晤士”报所刊载的“俄文書籍——給旁遮 普大学的贈品”一文摘要; 3) “巴基斯坦泰晤士”报 所刊载的“科学家們相互訪問”一文摘要。	
三、“巴基斯坦詩人和哲学家穆罕默德·依克巴尔”一 文摘要 ……………	(484)

編后 ……………	(491)
----------	-------

(一) 第一屆國際社會學大會的資料

(1950年于蘇黎世舉行)

一、第一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一九五零年九月四日—九日，在蘇黎世舉行了第一屆國際社會學大會。

這次大會是由國際社會學協會和國際政治學協會共同召集的。

有三十三個國家的一百八十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出席了這次大會，其中有一百一十位社會學家和七十位政治學家。他們代表的國家是：美國、西德、英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瑞士、法國、意大利、挪威、荷蘭、希臘、南斯拉夫、芬蘭、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秘魯、巴拿馬、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印度、以色列、埃及、土耳其、黎巴嫩、南非聯邦等等。

大會的組織委員會主席德·沙里斯在召開大會的第一次會議時，着重指出了聯合國科學文化及教育組織在創建國際社會學協會這個工作中所表現的首創精神的巨大意義，按照他的話來說，這種巨大意義就在於：使各國社會學家能夠“共同研究那些賴以保持世界和平和發展國際相互關係的問題”。①

1) 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總干事鮑戴的來信

以後在會上宣讀了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總干事鮑戴的來信，鮑戴號召全世界的社會學家們在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方面採取共同的觀點，按照他的意見，應當為建立持久和平的基礎服務。

鮑戴來信的主要論點如下：

按照他的意見，各國之間關係的性質，現在特別強烈地影響着

① 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國際社會科學公報，第3卷，第2期，第204頁，1951年。

人們的日常生活。然而，正象他所說的，人們生活在“旧觀念的基礎上”，因此社会科学方面的專家应当幫助人們在現代生活中辨明方向。“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並不把人看作物體（直言之，“不是把人看作物質”）。我們信賴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教育家……。因此，各國上層知識分子能夠互相接觸以便制定共同的（普遍的）觀點便是極為重要的事”（205頁）。

接着他又着重指出了這種關於制定共同觀點的思想：“在我們這個被嚴重隔絕了的世界中，只有建立一種對政治和社會事實的共同觀點，只有制訂一種人所公認的、運用於一切地方、一切場合的方法，才能建立一個意見一致的基礎，沒有這種意見一致，就沒有真正的世界和平”（205—206頁）。

來信中談到，在社會學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特別需要超出國家的範圍，在國際範圍內組織這一工作。“用這種方式來建立對人類發展問題的共同看法……這樣就能得到任何人都不能拒絕的真理”……

正如來信所談到的，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打算“建立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之間的國際合作，提高社會科學的研究水平，使研究方向轉向為建立和平所急需解決的問題方面。這些要求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而提出的，並不只是為了充實純書本知識”（206頁）。

“聯合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組織認為，為了使社會學和政治學能夠為改善國際關係服務，第一步便應當作到：研究國際關係的緊張狀態，探討有關政治學的方法問題，研究國際合作的方式和召開國際會議的技術，出版國際社會科學公報”（206頁）。

鮑戴在來信中着重指出，“如果認為社會學能夠毫無錯誤地確定走向和平的道路並使人類在這條道路上前進，這便是一種空想。但如不利用社會學的一切可能來達到我們偉大的目標，這就更加荒謬了”（同上）。

關於這種“偉大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來信說得十分含糊。在他的論斷中鮮明地表現出世界主義的情緒和人道主義的詞句。

鮑戴說，我們對人的信任應當以科學地認識人生為依據，並且應

当以“善于正視由于社会集团的驚人变化及其复杂关系給人类帶來的危害为依据”。

鮑戴認為，当代的趨勢的特点是：“民族关系方面的社会問題的重心正在向國際关系方面轉移”（206—207頁）。“任何一种社会学問題，都不能讓那些僅僅跟地方或民族的狀況有关資料所限制住：世界形势是越來越密切相互依賴的一个体系”……“当然，國家从来也不曾有过象現在这样广泛的权限，然而一个國家如果不注意整个國際局势，就很难確定自己的政策。……各國之間协作的新形式正在產生和巩固着，并且已經能够預見作为建立全球規模的政治組織所期望的國家法律單位的深刻变化”（207頁）。

鮑戴認為現代世界上正在產生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探索自由个体和社会組織之間的綜合……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間的綜合”（208頁）。

來信中說：“在抽象意义中談个人自由將是虛幻的……我確信，現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使命是开展能够確定一切人的真正自由条件的研究工作……，社会学走上这条道路以后，就能够同人道主义的傳統結合起來。它將为人类事業領域中沒有无关痛痒的真理（即不触及到人、人的本性和价值的真理）这一思想提供廣闊的園地……”（208頁）。“法西斯和納粹制度，正是由于輕視这一切，正是由于野蛮地看待人的問題，把人看作簡單的物体，才遭到崩潰。‘人的物質’激憤地摒棄了这种‘經驗’，歷史本身也斥責了人类的仇敌”（209頁）。

2) 維尔特在开幕式上的致詞

國際社会学协会的第一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勒·維尔特^①的開幕詞对社会学的作用和任务作了說明。

維尔特对維護和平这一任务給予了很大的注意，他主張社会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处。他說：“我們的当前問題是：假如我們愿

^① 勒·維尔特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社会学大会期間逝世，选出美國社会学家安德熱里代理协会主席的职务。

意保护文化，我們便应当使人們之間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和艺术日趋完善，我們便应当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在世界範圍內和平地生活和工作”……“如果能够避免世界兩大強國之間的武裝冲突，或許我們能看到从希望組織人类社会的兩種对抗性制度之中怎样確定一条和平的途徑（而这是一切头脑健全和善良的人們所希望的），更好地保証文化進步，滿足人民对衣、食、住的需要；为人們的才能提供广闊發展的場所；保証他們不受疾病、貧困、愚昧、暴政、剝削、罪行的侵襲；促進創造力、秩序和美德的發展；得到全体公民各方面的支持，使人們能够充分地掌握藝術和科学，維護和發展自由事業；为了爭取这一切，几个世紀以來人們曾流血牺牲……最后確定了这兩種制度中那一种制度能更好地促進人类的福利……”（213—214頁）。

維爾特号召參加大會的人不要忘記理論和實踐任务的联系。“如果我們的代表大會應首先關懷科学知識的進步，那我們也不應忘記擺在人类面前的重要問題”（214頁）。

維爾特对社会学及其在其他科学中的地位提供了如下的說明：

“从社会学試圖說明集体生活的一切条件和远景这一意义上說，是一般的社会科学。但各种專門学科是按照知識的積累和精確化的程度而形成的。因此就有必要重新探討社会科学中的每一專門領域的界限和职能。”

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占有同样的領域，然而所研究的問題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政治学在研究人們的行为的同时还特別研究各大國之間的关系問題；而經濟学則試圖从不充份的生產出發，來說明这种行为。

“社会学虽然是人文科学，但跟歷史不同，因为歷史所發生兴趣的是單独的、特殊的事实，而社会学則試圖表述、概括和利用歷史科学的資料來比較歷史事实。

社会学同人种学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人种学研究原始社会（沒有文字的社会）中的人类行为的一切方面”（214頁）。

“社会学同許多職業、同各种技能也有联系，社会学提供它們以可靠的科学資料，例如，社会活动、教育、法学、精神病学、犯罪

学、企業和工人之間的关系、种族关系、國際关系以及許多一般的和实践性的領域。

社会学的对象包括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学在人們受集体生活影响、反过来又影响集体生活的地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解决那里發生的問題”（214頁）。

“既然社会学是理智的科学，那它就負有注意紛杂的現象的使命：如注意家庭、社会、社会机构、私人团体、藝術、宗教、立法、科学，即注意成为問題并为社会学分析提供資料的各个領域”（214頁）。

“但是，并非所有这些領域都是社会学活动的基本部份和主要領域……

只有以下几个最重要部分才是作为一門專門科学的社会学的对象，至少在我國是如此：

1. 社会生活的人口統計学和生态学的基础；
2. 社会組織和社会集团的結構；
3. 社会过程或对社会相互影响現象的分析；
4. 社会心理学，或从社会与文化的观点來研究关系和个性，研究集体行为；
5. 社会進化和社会解体，或研究重大的社会改造及其对制度、关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并且研究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215頁）。

“正如我們的某些先輩所說的，我們認為無須說明人类社会的起源。从有人类社会起，人們随时随地都在过着集体生活。从我們的观点來看，集体生活是自然界的規律。

然而，如果說社会生活是一种普遍現象，那它的具体形式在時間、空間和职能上都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歷史經驗和条件）。由此便应得出一个結論，为了制定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方案，必須比較、研究社会、文化和个性。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們才能作出社会学所必需的說明和概括。

社会学是一門科学，它虽然尽量服从一切一般科学的重要規則，但是，它不同于精確的自然科学，并且也不同于研究自然界的生理現象和物理現象的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現象是有其自身困难的，但也有其可能性。首先，在这种場合下的观察者，总是同他所研究的对象有某种直接联系。这就为社会現象的研究者創造了接触和理解为其他科学家（譬如，物理学家）所不能掌握的現象的可能性。然而，对一个社会学家來說，更加困难的是，保証一个对沒有語言和理性的物質对象和实体的研究者所应具有的那种程度的‘客觀性’，——对一个科学家來說，这种客觀性是極其必要的”（215頁）。

維尔特承認，社会問題的研究者“在选择資料和假設时，在進行研究工作时，在証明和解釋时，是受他自己同他所研究的社会原則的影响的……”（215頁）。

維尔特談到在利用研究集体生活的比較方法时所產生的困难。“因为，为了比較現象就需要把这些現象从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歪曲它們的實質的歷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区分開來……同时，社会現象不是可以任意操縱和建立实验地点的簡單因素……”（215頁）。

維尔特特別着重指出社会科学發展的必然性。維尔特認為，發展社会科学比進一步發展自然科学更为迫切和重要。他說：“人类已經实现了駕馭自然方面的大胆的理想……工業和農業現在拥有大規模的生產手段，如果普遍地运用这些手段，就能够把人类从日常憂慮中解放出來。人类学会了战胜疾病。交通、通信、无綫电、电视等方面的技術進步实际上已經消除了距离……，但同时破坏的可能性也有了大規模的增漲。千百万人还不識字，还在用着原始的技術，苦于飢餓，在軍隊中充当走卒，喪失最基本的人权了……”（216頁）。

維尔特在談話中把“自治权、生存权、衣、食、住的權利、受教育权和參加共同決定的權利也都列入基本的人权”（217頁）。

他說：“在我們这个时代，沒有人敢于更多地为帝國主义（即一个民族統治另一个民族）的權利作辯護”，他以充滿威廉·加里遜精神的号召結束了發言。加里遜說過：“我的祖國就是世界，我的同胞就是人类”（217頁）。

3) 乔治·大衛在开幕式上的致詞

在大会上做第二个开幕詞發言人的是國際社会学协会的副主席乔治·大衛。他的發言是关于社会学研究在國際关系中的作用問題的。刊载于國際社会科学公报（1951年，第3卷，第2期，219頁）上的对大衛發言的評述指出，他強調了由于各國关系而產生的問題的社会学性質，他指出，只有把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同集体、而不是同个人联系起來，才能正確地理解这些关系的性質。

大衛反对只从心理学观点提出民族性質問題和民族关系問題。他說，有的人認為，“既然民族是由个体組成的集体，而民族关系是自觉的关系，因而也是个体之間的关系，那末关于民族性質和关于民族关系問題只是同心理学發生联系，只能叫做‘社会’心理学”（“國際社会学报告汇编”1950年，第9卷，4頁）。

大衛在回憶塔尔德和杜尔克姆的拥护者之間的爭論时，指出說，“从那时到現在已經过了半个世紀了，在这段时期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得到了發展，这些科学的拥护者之間的矛盾緩和下來了，現在所談的是它們之間的合作問題”（同上，5頁）。

大衛說，他同意杜尔克姆^①的社会学概念，在杜尔克姆时代，“也正如現在一样，也談到了用有关現實的科学來代替人为的思想分析，然而，当时無論如何也不会把事物的現實性理解为該詞的物質意义”。同时大衛提到，杜尔克姆号召人們从外部來觀察社会現象，把它看作一种外在的現象，因为这种現象正以这种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如果現象的这种外貌只是表面的，那么这种幻想將會随科学的發展而消失……（6頁）。

①爱弥儿·杜尔克姆（1858—1917）是法國的著名社会学家，是集聚在“社会学年”年刊周圍的一个派別首領。杜尔克姆認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的对象，他認為“社会事实”的特征具有所謂“外在的強制性”——綜合一定活動方式的許多表現。他把社会事实同个体心理現象分开了。

杜尔克姆不承認階級，他用职业集团來代替階級；他認為國家是“独立的機構”，而社会矛盾是必須通过改革來消除的不完善現象。杜尔克姆認為，社会在思想中是心理的集体，“社会事实”是具有外在現實的集体观念，它同个体观念有着本質的區別。

大衛強調說，他不想貶低心理學在解釋社會現象中以及在这种國際關係情況下的作用。“然而，假如我們企圖把個人的活動、趨勢或意向孤立起來，那麼這就會剝奪這些現象，要求從前後關係來觀察每一個別事實的、真正的現實性”（7頁）。“這就意味着個性的首創精神是在它所特有的結構範圍內實現的……”。接着，大衛說道：“正是美國的社會學分析了個性的結構基礎和形成個性並與個性環境不可分割聯繫着的因果性，才开辟了最有趣和有益的遠景”（7頁）。

大衛指出，必須在個體與其環境的聯繫中研究“相互因果性”；分析集體的以及個人的意見和情緒，同時不要把心理現象的研究同社會學現象的研究分離開來。按照他的意見，沒有純形式的個體的相互關係：“個體的相互關係——無論看來是如何純粹的個體之間的相互關係——永遠不會是個體對周圍個體的關係，周圍環境也許是可以不加重視的”……。“混亂的原子論，應當組織起來的無形物質，既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也不是知覺所固有的……，個體只有在集體中才能生活，而在集體中生活，必然要有結構”（8—9頁）。

大衛在敘述了這些一般的見解以後，接着把這些一般見解應用到所探究的問題上：“研究國際關係，首先應當從民族的結構和形成民族的因素出發……不能把這種結構現象看作是簡單的現象，相反地，它是同人的生活條件的雙重性相對應的重要的雙重性。由此便產生了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最密切聯繫的必然性”（9頁）。

按照大衛的意見，現代正在產生着重要的和創造性的結構的衝突：“純民族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現代的、以大陸或世界規模產生的問題面前已經過時了……由此便產生了使人們耽心的問題：歐洲集團、或大西洋集團、或世界集團之中的民族自治權問題，這一問題的社會學的性質是很難推翻的，普遍都認為這個問題是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問題”（15—16頁）。

因此，正如維爾特一樣，大衛非常注意宣傳關於必須建立所謂“超民族”組織的世界主義觀點。

4) 柯文西·賴特在開幕式上的致詞

在大会開幕式上第三个發言的是國際政治学协会主席、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柯文西·賴特。

柯文西·賴特的發言發表在“國際科学通报”第2卷，1951年，299—305頁。

柯文西·賴特开始就引証說，对未來的人类來說，沒有比科学地研究管理問題更重要了。按照他的話說，法西斯主义輕視人的价值。他說：“政治学归根到底是以改善人类相互关系为目的的”，他說，“由于战争、集权主义……以及惨无人道的暴政給我們这一代所造成的危害，改善人們之間的关系这一任务就特別迫切了……”。“鼓舞我們协会的理想就是消除这种腐敗的現象，用科学的方法來解决政治問題”（同上，299頁）。

接着柯文西·賴特提出下述問題——能够把政治看作科学的对象嗎？与其这样，还不如看看政治是否是个体創造的領域？同科学相比，政治不更是一种藝術嗎？（因此，他提到了洛尔特·蕭夫斯貝里、約翰·洛克、詹姆士·麥地遜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最后……又提到諾貝爾·舒曼在建立欧洲煤鋼联合的事業中所起的作用……）。

柯文西·賴特給科学提供了如下的定义：“科学不是絕对的、永恆的、普遍的規律的發現和形成，而是利用理性、試驗方法來預言事件和駕馭事件”（300頁）。

以后，他又談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區別問題：“社会科学不同于精確的自然科学之点就在于：由社会科学的发展所產生的概括，能够对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个体和集体發生影响。天体不会为了適應天文学的概括而改变自己的运动，然而能够由于政治学、政治經濟学、社会学方面的專家所做出的結論而改变人和集体的行动”（300頁）。

柯文西·賴特在發言中对所謂政治学的内容問題，給予了很大的注意。

按照他的話來說，在美國所謂政治学是一种包罗極广的学科，它

分为五个部份：1.政治理論；2.政策和輿論；3.民政管理；4.公民权力和宪法权力；5.國際关系（政治学的最后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探究前四个問題）。

按照他的意見，“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彼此有联系的，例如，研究选举制度就会牽涉到政策和輿論問題，民政管理問題是同民主問題有联系的，当行政機構發展到極端時，行政就会排挤政策，社会就会变成極權的社会”（303—304頁）。

柯文西·賴特也如大会的其他領導人一样，表示拥护世界主义：“当代的一切公民和政治活动家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公民和同意世界觀念的人……”（303頁）。

柯文西·賴特在談到政治学的作用時，着重指出了這門科学的实用性及其同階級斗争的关系。他說：“教授的講壇应当同政治活动家的办公室成为比鄰”……接着又說：“政治与其他社会活动領域（政治經濟学、法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險、人民保健事業、教育）的不同之点是：它的實質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是以追求共同目的的合作为前提的，这些目的如保証生產、正义、秩序、福利、人民健康、普及文化……，与此相反，政治是以反对派的存在为前提的。按其實質來說，政治力求建立、支持和發展一定的人的集团（尽管有着其他集团方面的反对）……如果能够消除由集体方面而來的反对立場，如果人們能够建立共同的信念，达到相互了解，忠实于共同的理想、統一的文化……那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人們就会走入新的黄金时代……”（301頁）。

“所有这些看來都是美丽的理想，然而，当这种理想實現時，就会成为不太美丽的了……并且会導致集權的暴政”（301頁）。

接着，柯文西·賴特又攻击了苏联，他說：“馬克思主义的无階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國家应当消滅）的思想，在實踐中只能体现为殘酷的暴政，在那里千百萬人从事着强迫劳动，可以看到在各种劳动階級的消費之間的驚人的不平等現象，在統一政党統治下成为奴隸的民族，國家权利达到了空前的規模，不斷進行着將引起軍事行动准备和能够消滅文明的冷战”（301頁）。